

# 一个人和一个时代

## 谢孔宾传

□耿 立 编著

战胜日伪的摩擦和“扫荡”是克服困难的前提。在湖西地区,除边境上有个小羊山外,多是平原。在平原上打游击很困难,敌人的坦克、骑兵来袭击,跑都没地方跑。为了对付日寇对根据地的“扫荡”,依靠群众的创造,把道路挖断,挖上坑道,使敌人无法长驱直入。从1940年,在八路军控制的地区,处处都挖了沟道,把村里村外的道路都挖成沟,大路挖大沟,小路挖小沟,那时叫做路路有沟,沟沟相通,也叫抗日沟。宽的沟达丈五尺,深有丈多,一般也有七八尺深。从村里挖至村外,从这村挖到那个村,以此对抗日寇的“扫荡”,群众也增强了抗日的信心。日本鬼子如来侵略骚扰,你从东边来,我从西边沟里出去,你从北面来,我从南面沟口跑了,不仅人能跑,连牲畜都能从沟道里转移。逐渐地,沟沟相连,一连能搞十几个村。后来,甚至数百条沟都互相连接,敌人对沟的构造不熟悉,他们不敢下沟,只能在沟上走,而沟里的人则可以向沟外打枪,沟外的敌人被打死了,还不知从哪里来的枪弹。他们即便是发现沟道,又不知道沟里有多少人,通向哪里,不敢贸然下来。人们把这种游击战叫做坑道战,以坑道作为一种战术,发展得也越来越完善。两条沟交叉处,挖到十字路口上,中间留段不挖,建上碉堡作为掩体,隐蔽着打击敌人,不管敌人从哪个方向来,都可以及时发现。另外沟的两边还挖了站沟,人在站沟上站起来,可以看见外面敌人的走动,蹲下来敌人就看不见。如果有敌人在沟上走,沟里的人站起来,可以猛然刺他一刀,甚至抓住他的腿,将其拉下摔倒,使敌人很难应付。特别是到了晚间,敌人更是不敢走动。

由于进行坑道战,找到了对付日寇的办法,根据地相对有了保障。而后,共产党号召群众种好庄稼,发展生产,并发放贷款,度灾救荒。同时,军队和地方干部也都进行生产自救,节衣缩食,与群众共同渡过难关,军民关系、党群关系逐渐好转。

在生产自救的同时,他们也大力开展根据地的政权建设,发展统一战线,进行民主建政。根据地各县都先后成立了抗日民主政府,建立了湖西地区参议会。1940年下半年,湖西地区还选举产生了参议会,各县都选举了参议员,全区召开了民主参议会。大会在参议员中共产党员占1/3,进步民主人士统战对象占1/3,各阶层人士和知识分子占1/3。在这次会上,郭影秋被选为湖西地区的参议长。他说,此会上还出了个笑话。参议会成立后,要发通电,他是起草电文的召集人,觉得这个事情比较简单,就让下面的几个人去

办,直到会前也没有检查。在大会要宣读电文时,下面的人把电文纸送给他,才发现原来是张白纸,满篇纸上一字没有。但会议议程已经宣布了读电文怎么办?当时他毕竟年轻,思路也快,就急中生智,略加思索,边想边读起来,会场上也没有发生什么意外。下场后,他询问那几个人,怎么随便递给一张白纸,是不是想故意让他出洋相?他们开玩笑说:“我们事先未起草,把这件事撂下忘了,等开会了,想起草又来不及了,几个人合计,就是临时起草了电文,你也不会照着念,还不如给你张白纸,由你自己随机应变,你不是随即就编出很好的电文吗?实在是名不虚传的大秀才!哈哈!”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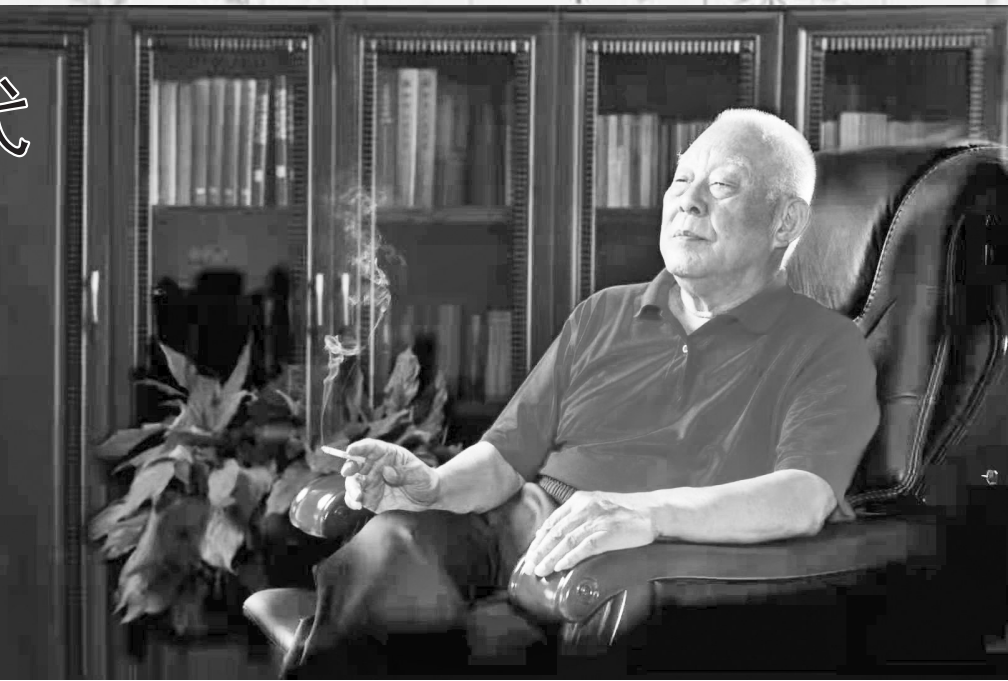
这是当事人留下的湖西单县的历史记载,人,是不可能脱离这个大时代的,谢孔宾就在这个大时代里,虽然当时他只是一个儿童,但他不知道外面的各种因素氤氲聚会,改变着这个生态。

谢孔宾13岁上初小了,语文课一看就懂,容易把握。鉴于年龄大,第二学期便进入高级小学了。读高小时语文程度名列前茅,只是数学基础太差,当时还不会列横式,月考时算术考了4分,真丢人。后来,他加紧练习,急起直追,第二学期就赶到前列了。第三学期考取了第一名。当时的《算术指南》《千题详解》中的四则杂题、分数、开方等等都一一过关了。

在战争年代奋力读书,是那个时期一些人对民族和明天抱有的一种希望。何兆武在《上学记》写过战争年代的读书,他说:我想,幸福的条件有两个,一个是你必须觉得个人前途是光明的、美好的,可是这又非常模糊,非常朦胧,并不一定是什么明确的目标。另一方面,整个社会的前景,也必须是一天比一天更加美好,如果社会整体在腐败下去,个人是不可能真正幸福的。这两个条件在我上学的时候恰好同时都有,当时正是战争年代,但正因为打仗,所以好像直觉地、模糊地,可是又非常肯定地认为,战争一定会胜利,胜利以后一定会是一个非常美好的世界,一定能过上非常美好的生活。那时候不只我一个人,我相信绝大多数青年都有这种模糊的感觉。人总是靠着希望生活的,这两个希望是最根本的,所以那时候虽然物质生活非常之苦,可是觉得非常幸福。

我们知道,正是这种对未来希望的感召,我们能看到一些师生在战争的间隙,在破庙,在偏僻的农村,在田间地头,在村头的牛屋,还是一如既往专注地学习、上课,仿佛“一簞食,一瓢饮,在陋巷,人不堪其忧,回也不改其乐”的颜回。

少年人身上背负的是国家



的希望,少年人身上背负的是未来的责任,少年人的选择便是这个民族未来的方向 and 选择。

## 第五章 乱中求学

谢孔宾早就意识到,要想改变自己的处境,只有求学一途,但求学的路途时时陷入困境,走入绝路。少年时代,正是一个充满幻想的时辰,但他却时时感受到世事的艰难,那是一个民族命运决战的时代,各个阶层都面临新的选择。

1945年,谢孔宾15岁,那年8月15日,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。然而,1946年内战开始了,单县及湖西成为国共争夺的重要战场。

郭影秋在回忆录里有一章“八千子弟重返湖西”,这是了解少年谢孔宾不可多得的在场感的史实记载。郭影秋是当时共产党湖西的主政者,且是湖西人,是共产党内有名的知识分子。

郭影秋在“八千子弟重返湖西”说:

我了解到蒋介石发动全面内战后,徐州地区的国民党派了重兵,对湖西解放区进行“围剿”,不少恶霸地主作为还乡团,为国民党军队带路,逢人就杀,见房就烧,其疯狂性野蛮性以及对革命力量的仇视程度,实属登峰造极。当时,湖西地区的领导束手无策,整个湖西很快垮了,我们的军队和群众像赶鸭子似的被赶了出来。

由于1946年9月国民党打进湖西之后,烧杀抢掠,派款征粮,处处安设据点建立伪政权,抓夫抢兵,使湖西损失惨重。我们被杀掉的干部家属和群众,即达四千余人。

我们原来在湖西根据地做了大量的统战工作,团结了不少开明士绅、知识分子,至国民党上层中的抗日人士。在国民党卷土重来进行疯狂屠杀的白色恐怖下,这些统战对象中有些人又依附了国民党。我们有些在基层工作的同志,针对这种状况提出了要杀“红脸奸臣”的口号。他们说这些人表面上和我们搞统战,好像是红脸,但敌人来他们又跟着跑,这些人就是“红脸奸臣”,应该杀掉。有一次,我到河庄,去看个叫何方成的统战对象,结果他家房倒屋塌,家里什么都没有了。有人偷偷告诉我,何方成被当做“红脸奸臣”杀掉了,财产被分了。我才发现杀人面太宽了,在敌人大

举进犯时,我们都立不住脚,不得不撤出去了,怎么能要求统战对象定要撑着呢。

1946年8月20日,国民党30万大军沿陇海线向北进犯。国共双方在单县展开“拉锯战”,国民党来了,共产党撤了,共产党打过来了,国民党撤了,就如拉锯,来来往往。

国民党军队占领单县后,各处设立据点,并纠集流亡地主组成还乡团,回到家乡进行反攻倒算,湖西地委将干部家属、老弱病残、后方医院和学校,转移到黄河以北。

但当时共产党也组织武装工作队,与还乡团对着干,秘密潜伏穿插回单县。他们的方式就是昼伏夜出。当夜半人困马乏大家和对手都进入梦乡,这些武工队们就静悄悄摸进村庄,在夜间,他们分头到各村高处,用喇叭高呼:“大家坐起来听消息”。再一招就是在逢集的时候,武工队在集市上,突然控制集市,停止5分钟,大声宣传,然后迅速撤走。

那时的谢孔宾在家里,几乎夜夜惊魂,四处听见枪声。兵荒马乱的年月,保命要紧,老师走了,学校停办,谢孔宾就在家务农。这时的谢孔宾犹如一个困兽,在自己的村子里,见不到外面的世界,一切都像是隔绝了。他很苦闷,那时正是充满幻想的年龄,虽然那是死亡拉锯的时候,但他却觉得,对知识的追求,对外面的世界的向往,成了他的精神支柱。

出身农家的谢孔宾,白天在家干农活,翻地、耕作、打场、收割都会。到了麦收天,就下地割麦子,头顶大太阳,人站在麦子里,好像能把人晒化。一到夏天,高粱晒红米了,那高粱地高得人进去就没了头顶,他就会扯高粱叶,既可以编蓑衣,也可烧火或者喂羊。夜里,或者是下雨天,他就在家练习毛笔字和读鲁迅的文章。

练习毛笔字,就像他的功课。他喜欢颜真卿书法的雄强、大气、端方,“三更灯火五更鸡,正是男儿读书时。黑发不知勤学早,白首方悔读书迟。”这是颜真卿写的《劝学》,反映出他的学习态度。他三岁时丧父,由母亲抚养长大,年少时学习勤奋,家贫缺纸笔,就用笔蘸着黄泥水在墙上练字;长大后学识渊博,有才华,尤其擅长书法。谢孔宾先是临写《多宝塔》,接着临写《勤礼碑》。他理解了颜真卿的书法的三境界:第一境界立坚实骨

体,求雄强书风。第二境界含字内精微,求字外磅礴。第三境界臻神明变化,达生命烂漫。

谢孔宾的性格,慢慢地开始潜移默化,写《争座位帖》,颜真卿刚直不阿、疾恶如仇的性格后来就在谢孔宾身上扎下了根。

在平定安史之乱中立下了大功的名将郭子仪来长安朝见皇帝唐代宗,唐代宗设宴欢迎他。本来,按照朝廷规定的礼法,宴会上文武官员的座位前后顺序,应该按照官职大小的顺序排列。可是,负责安排座次的官员郭英义,为了讨好唐代宗的宠信太监鱼朝恩,竟把官职地位比他高的尚书们的座位排到了他的后面。宴会上鱼朝恩十分得意地坐在前边,颜真卿见了十分气愤,等到宴会结束,他对大家说:“鱼朝恩不过是个善于拍马屁的小人,没有什么功劳,他的座位凭什么排在前边!”“他是皇上的红人儿,谁惹得起?还是算了吧!”几位怕事的尚书劝他。“不!这有关国家的尊严,不是件小事。这个座次我一定要争!”颜真卿坚定地说。回到家,颜真卿怒气难平,马上提笔奋笔疾书,不一会儿,一封责问郭英义的信就写出来了。

这封题名为《与郭仆射论座位书》的信,写得义正辞严,历数了鱼朝恩的种种罪恶,痛斥了郭英义溜须拍马的无耻行为。而这封信里的字,颜真卿写得笔力雄健,气势夺人,把他愤恨难平的心情表现得淋漓尽致,所谓字如其人,人字合一,风格即人,这是绝好的代表。

人们说:读《出师表》不哭者不忠,读《陈情表》不哭者不孝,读《祭十二郎文》不哭者不慈。

而谢孔宾视为最爱的是颜真卿的《祭侄文稿》。

在唐朝玄宗时期的安史之乱中,颜真卿和他的堂兄颜杲卿表现得铮铮铁骨,他们兄弟一起起兵勤王讨伐叛军。颜杲卿乃常山郡太守,杲卿率军和叛军艰难苦战,最后实力不敌被叛军俘获。

安禄山使人将颜杲卿和他的小儿子颜季明押到近前,问颜杲卿为何反叛他安禄山,颜杲卿大怒,圆睁双目,大声叱骂:“我乃大唐臣子,为国讨贼,何谓反叛?”安禄山恼怒,着人用铁钩钩断颜杲卿之舌,可颜杲卿仍威武不屈叫骂不绝,最后安禄山下令把颜杲卿父子活剐而死。